

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

歷史文化篇

原武道
陳湛頤
王向華
編



商務印書館

原武道 陳湛頤 王向華 編

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

歷史文化篇

商務印書館

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

——歷史文化篇

編者：原武道 陳湛頤 王向華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次：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257 0

Printed in Hong Kong

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

歷史文化篇

目 錄

導言	原武道	1
從長崎“泰益號”的文書看戰前長崎 華商的亞洲海上貿易網絡	市川信愛	19
論近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王曉秋	47
晚清改革與何啟、胡禮垣的日本觀 ——《新政真詮》的初步探索	趙雨樂	59
黃遵憲和他的亞洲外交 ——以琉球・朝鮮論為中心	原武道	75
十九世紀中日現代化的同途殊歸 ——「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論的再思	葉國洪	95
香港早年的日本娼妓	陳湛頤	133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澳門、日本關係 ——在澳門的親日報社	宜野座伸治	153
文化傳統的娛樂活動化 ——近期的阿伊努族文化運動	小川正志	163
橫濱華僑社會的探討 ——日漸同化的步伐	高橋李玉香	189

西方與日本的現代意識

- 現代化理論及日本的宗教研究 岡野正純 211

- 日本研究與偏見的構造 容應莛 225

日本流行文化風靡香港

- 論日本音樂界對香港樂壇的衝擊 李活雄 237

「誠」與《萬葉集》

- 日本古典文藝理念斷簡 姜羣星 251

附錄（一）

- 作者名錄 263

附錄（二）

- 《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日語教育篇》目次 265

導言

原武道

收錄在這本論文集集中的，是 1995 年 11 月 11 日和 12 日兩天在香港大學舉行第二次香港日本研究・日本語教育國際研討會時發表的論文。在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計 48 篇，收錄於本論文集者 20 篇，內分「歷史文化篇」13 篇；「日語教育篇」7 篇。發表時所用的語言有中國語（普通話和廣東話）、日語和英語，為使研討會的成果能更廣泛地為各界對日本有興趣的人士分享，而不局限於從事日本語教育或日本研究的專家，輯入本論文集時「歷史文化篇」統一用中文；而「日語教育篇」則用日文。

籌辦這次研討會時，我們將主題定為「日本和亞洲地區的華人社會」。亞洲各國在過去二十年間經濟迅速發展，現時，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快將超越日本。與經濟增長並肩而行的，是由 1980 年代起至現今，各國政治持續穩定，不僅「四小龍」的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就連中國和東盟等國的國民，對現狀的自信和對將來的樂觀情緒均大為加強。香港是「四小龍」之一，毗鄰的中國雖然經歷過天安門事件的衝擊，但經濟發展卻絲毫沒有呈現衰退的跡象。種種因素，都不難令人產生亞洲太平洋地區近年急速的經濟成長是由華人帶動的這種想法。

是次研討會主題所指的「亞洲地區的華人社會」，範圍不限於中國國內的中國人社會，還包括北起韓國、日本，南迄東南亞、又或現代所謂 ASEAN 這一地域內由華僑組成的華人社會。在這一個廣闊的地域——借市川信愛氏的說法，是「亞洲海域」²——內，香港位處中心，立足香港，縱覽此一地域跟日本的關係，正是本研討會的目的。以下將概述收錄於「歷史文化篇」、「日語教育篇」中的諸論文，並嘗試探索這次研討會究竟給我們甚麼提示。

歷史文化篇

在亞洲的前近代時期，遠自明代開始，以華南地區為中心，華人已憑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術建立了一個北起九州、朝鮮半島，南迄菲律賓羣島、爪哇、暹羅、馬六甲的巨大交易網絡。踏入 17 世紀後，日本方面，德川幕府實施鎖國政策，禁止日本人出國；中國方面，明亡於清，清廷對於跟海外接觸，表現消極，儘管如此，以駛入長崎這個日本唯一對外貿易港的外國船而言，「唐船」的數量依然遠多於荷蘭的船舶。正如大場脩教授所說，我等漫步長崎時所感受到的外國風情，與其說是荷蘭的，倒不如說是華南的情調。³ 幕末開國後的日本，英國人、美國人可以在橫濱、神戶、長崎等根據條約開埠的港口居住。這些洋人多帶同華人買辦和傭人自上海等地前來，因此橫濱、神戶等的通商口岸文化雖具有日本的特色；但整體而言，卻屬於在中國上海等地開展的中西文化混雜的通商口岸文化的延長。

市川信愛氏在其論文⁴ 中首先提綱挈領地追溯亞洲海域網絡至明末，他提出：在江戶時代，華南（浙江省和福建省）和長崎之間早已存在以絹為主力商品的交易管道。即使中國處於改朝換代、政局動盪的情況下，這條管道仍然暢通。在長崎貿易達到頂點的元祿期（1688－1703），長崎六萬四千居民中，唐人約佔一萬（15%），這個事實不但反映前述貿易管道的重要性，還帶出以下兩點叫人饒感趣味的事情：一是「鎖國」日本境內居然有如此規模的國際都市；⁵ 二是從國際都市長崎外望，日本人見得到的世界就是中國。

19 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被迫開放口岸通商，歐美貿易商的活動範圍大幅擴大，廣泛分佈於亞洲海域的華人社會被迫作重大的改變，一部份華人如上文所述，用代理商、傭人的身份積極參與歐美貿易商進行的亞洲貿易，並為其發展作出貢獻。另一部份人則當苦力，在東南亞、南北美和澳洲等地出賣勞

力，在這些地區的殖民地化過程中留下了巨大的足印。按照前述兩種分類，市川氏認為日本的華僑似出身於「買辦代理商」者居多，與從苦力起家而累積起商人資本的東南亞華僑殊異。與此同時，通過分析長崎華商“泰益號”龐大的原始資料，市川氏指出：近代華商利用既存的交易網絡，就歐美商人沒有沾手的海產、中藥、日用品等傳統商品進行交易，為延續和發展亞洲各地貿易作出很大的貢獻。由此觀之，亞洲海域內的「近代」，跟亞洲海域內傳統的華人社會並非水火不相容，反而存在着互相補足的關係。

亞洲海域內的「近代」，是歐美資本主義商人標榜「自由貿易」以打破中、日兩國海禁政策下展開的，不過，由於西方挾着工業革命的成果，用火砲、鐵甲艦等犀利武器為後盾東來，存亡所繫，亞洲海域諸國被迫舉國傾力應付，日本方面，明治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富國強兵政策；中國方面則有洋務運動等連串的強兵政策。以兩種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並行的中、日現代化運動為背景，孕育出中國人的日本觀和日本人的中國觀來，因此，當中、日兩國互相觀察時，中、日關係之外，往往添上這樣一重意識：鄰國是怎樣應付歐美列強侵略的呢？王曉秋氏在他的論文⁶中概括談到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初中國人有關日本的論著、又或日本人有關中國的論說時指出：「中日文化交流常出現一種有趣的現象：以第三種文化完成中介、傳播的任務。」19 世紀中葉，中國、日本互相授予對方的，除了歐美最新科學文明的知識外，還有一種深刻的危機感：面對歐美列強侵略，自國也許會亡國滅種。對於歐美列強的侵略性，幕末日本較諸在鴉片戰爭中受挫的中國更早感受到一種迫切的危機感，在中國，討論近代化有其必要的輿論中透出尖銳的危機感，要到甲午戰爭中敗於小國日本後才出現，這是因為吸收西洋科學軍事技術的洋務運動，時間上雖然先於明治政府的富國強兵策，但思想上賦予為何要吸收西洋技術的論據，明治日本卻比中國先行。

趙雨樂氏⁷ 和原武道氏⁸ 的論文都選取清末對日本改革有認識的人士作例子，進一步探討王曉秋氏所概括的問題。

趙氏所討論的何啟、胡禮垣，分別是住在香港的基督教牧師和買辦商人的兒子，二人俱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何啟後來再赴英國修讀醫科，隨後又改攻法學，取得律師的資格後返回香港，以華人精英的身份活躍於香港社會。胡禮垣曾遊歷日本和南洋等地。何、胡二人均不屬中國傳統的精英階層，而是「華僑的」（所謂非正統的）人物。他們談及日本的新政時，不僅涉及政治制度的變革，還着眼於振興民間企業的措施，正足以表明他們華僑的立場。

原氏有關黃遵憲的論述，一定程度上也指出了黃遵憲華僑的（非正統的）本質。黃遵憲是客家人，雖接受傳統的教育，但科場失意，惟有轉當外交官，跟能夠青雲直上的仕宦之路絕緣。黃氏以外交官初到日本赴任，適逢明治維新後富國強兵的政策終於找到頭緒，但明治日本又尚未定型之際。清廷官員如李鴻章等當時雖已留意到明治維新，但他們的維新觀卻偏向否定的一面，強調日本中央政府（幕府）崩潰後，新政權莽撞的強兵策只帶來社會混亂和財政困難。然而，同一時期，黃遵憲在撰述的《日本國志》中卻指出：明治維新不止於政權的轉換。明治政府推行的政策容或包含種種困難和矛盾，但日本就整體而言，是朝着發展的道路邁進的。黃氏這種見解，堪稱是劃時代的。他又提到：中國的改革不應從保存清朝政權的立場，而應該從民族的國家的見地來思考。這為甲午戰後康有為、梁啟超等改革派奠下思想的基礎。據原氏的論文說：黃遵憲的外交論中談及中國跟傳統朝貢國琉球和朝鮮的關係時，也是從保全中國國益的角度、予以近代的再解釋而總結出來的。

帶有國家存亡危機感的改革論廣泛為中國有識之士所認同，是 1895 年中國在甲午之戰中敗北以後。大國中國敗於小國，由是引發出疑問：明治日本能夠汲取西洋的技術文明而變得強盛，可是中國為甚麼辦不到呢？像這樣試行比較、評價兩

國鴉片戰爭以後所走歷史道路的議論初見於這一時期，也可說是上述危機意識的反映。其後，日本走向軍事大國，不斷進行侵略；中國則長期陷入內戰和分裂中，中、日現代化比較論由是成為中國知識份子日本論的重要課題而反覆為人論述。自中國推行經濟開放改革政策後，日本「現代化」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再度成為歷史問題。非也，與其說是歷史問題，毋寧說是熱門的論題而廣受討論，葉國洪氏的論文⁹可說亦屬這些比較現代化論的一個嘗試。

葉氏論文以甲午戰後具代表的改革論、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為探討的對象。據葉氏說，「中體西用」與幕末維新時的「和魂洋才」論相似。基於「和魂洋才」對明治維新後日本的現代化貢獻巨大，「中體西用」亦理應對清末中國的現代化有大貢獻，因此，對於中國近代史學家論斷「中體西用」為半心半意、不徹底的近代化論，又給予否定的評價，謂其理應失敗而失敗，葉氏並不以為然。

然而，葉氏的嘗試卻令人感到若干疑問。首先，葉氏沒有深入探討日本的「和魂洋才」，他所臚列的例子，幾乎全屬所謂近代日本「天皇制國家」的一面而漠視近代日本的黑暗面，將日本近代化之途看得過於單純，對其成果的評許亦逾其份。此外，葉氏對張之洞「中體西用」的評價也偏於在觀念上強調其進步性，在當時的歷史狀況下，「中體西用」究竟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呢，很遺憾，論文中並沒有清楚說明。就中、日近代化作比較時，很多人均沿直線比較的角度，將19世紀以來兩國歷史視為「日本先進、中國落後」。葉氏認為中國的「中體西用」論在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上，較諸日本的「和魂洋才」論毫不遜色，似乎也陷入直線比較論的巢臼中。

日本的現代化對日本國民來說，不僅帶來生活質素向上的光明一面，還伴有戰爭、貧困、思想管制等陰暗的一面。反映出近代日本的矛盾衝擊到日本社會中力量最單薄的階層，是很多出身於九州天草、島原等貧困農村地帶的年輕女性賣身到海

外當娼。正如陳湛頤氏在論文¹⁰中引用到的說法：「首先是娼婦，接着是富山的賣藥，然後是軍隊」，這些女子以日本娘子軍的身份，突顯了日本向亞洲海域進侵的一面。被稱為「唐行」的海外娼婦不單為本身的家族作出犧牲，以香港的娘子軍為例，利用運煤輪以偷運貨物的方式將這些女子暗藏來港這一事實，¹¹ 正好說明海外娼婦的輸出，是以「非正統經濟」(alternative economy)的形式跟日本近代的經濟發展緊密連結一起的。

亞洲海域各地跟日本人關係最密切（對各地域來說，是最不幸）的時期，是日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太平洋戰爭）的軍事佔領。然而，其中較特別的是澳門，由於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既不加入盟國，又非軸心國成員，因此屬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境遇便跟香港不同，得倖免於日本嚴苛的軍政統治。澳門雖是中國人的社會，但在中日戰爭中卻保持中立，立場奇特。然而，由於香港、廣州這兩處澳門對外交通的聯繫（nexus）都落入日軍手上，命運攸關，自不能漠視日本政府、日軍的意向。宜野座伸治氏用心地調查了戰時在澳門出版的兩份中文報章發行的經過和發行者的背景，將焦點集中於中立的澳門。¹² 雖然不明瞭的地方很多，但從宜野座氏的敘述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在抗戰這種情況下澳門發行的親日中文報章中，各種利害交錯：當中有澳門政府的考慮，也有日本外務省的盤算和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中國人的想法，背後的事情實在異常複雜。

明治以來日本的「發展」過程，同時是塑造新日本人的過程，新日本人是些可以為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國家作出貢獻的人。維新政府一方面廢除了江戶時代的身份制，揭棄四民平等，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將國民視為「平民」，要他們向皇國奉公的體制。部落民、琉球人、被強迫移徙日本的朝鮮人、台灣人和蝦夷人等，因歷史、政治、民族等因素而跟日本國內所謂「大和民族」有不同固有文化和自我認同（identity）的人，均被

迫「同化」或「歸化」成日本人。小川正志氏透過訪問當事人等，一直追尋¹³自1980年代開始，在阿伊努人中間興起的運動。這些運動，目的在於重建、復興在日本政府同化政策下經已湮沒的阿伊努文化。用訪問當事人方式進行調查的，還有高橋李玉香氏，她的研究對象是橫濱華僑社會的歷史和現狀。¹⁴橫濱是幕末開國以後日本最大的通商口岸。

從小川氏的論文中我們得知，作為「同化」政策對象的少數民族，心理負擔是很沉重的。為着怕別人知道自己是阿伊努人（即與其他日本人不同），以致連醫生也不敢去看的「日本人」化，無非是要向外人誇示日本是單一民族社會而已。其次，我們知道：縱使少數民族的文化消失湮沒，少數民族的自我認同（identity）仍然強韌地存續，這種自我認同不一定在日常生活中全面地顯現出來，而是通過定期參加有意識舉行的文化活動、例如阿伊努語教室及其他文化活動而得到確認的。小川氏指出：隨着第一代活動家作為民族運動而開展的復興阿伊努文化運動日漸推廣，參加者正不斷增加。不過，這是顯示戰後日本社會作為多元的市民社會經已成熟呢？又抑或大眾社會化的日本年青人，連民族運動也將之徹底娛樂化呢？

高橋氏的論文談及橫濱華僑社會的歷史變遷和最近的變化。上文提過，市川氏曾指出：日本華僑社會以從苦力起家的「刻苦成家型」，多於買辦、代理商的類型。高橋所列舉的統計數字顯示：就是維新期的橫濱，廣東籍的勞工在中國人人口中也佔壓倒的多數，以整體橫濱華僑社會而言，他們出身的社會階層也算是低的。不過，橫濱華僑絕大部份都投身所謂「三把刀」（剃刀、裁剪刀、菜刀）的職業，原因不在於單憑自己的手藝，即使沒啥資本也可做生意；而是日本設下重重關卡，堵住了他們踏入日本主流經濟的道路。具體的例子有：日本政府沒有移民政策；「歸化」（取得日本的國籍）的手續非常繁雜；對於永久居留日本的外國人，出入境設有種種限制；文部省不承認中華學校為正規學校等，高橋氏指出：不單在法律上有差

別，就是社會、經濟方面，如升學、就職等也存在差異。

高橋氏的論文同時提及：在華僑社會裏，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和本身對中國人的認同也因世代而異。第一代華僑中，牢守中國文化，堅拒「歸化」日本的人很多，但到第二、三代時，由於他們已將日本視為永住之地，同化的傾向逐漸增強，同化的程度例如第二代、第三代中跟日本人通婚者日多，日常生活中也幾乎全部使用日語。同時，1970 年代中日建交後，日本和台灣的关系起了微妙的變化，由於前景不安，據說台灣華僑歸化的人增多了。這種為求生活安定而選取同化、歸化之路的動向，不止在橫濱，在日本別處的華僑社會、甚至分佈世界各地的華僑社會中也相當普遍，當然，這樣選定的新的自我包含很多矛盾，每給當事人（當事人的家族也在內）造成沉重的心理負擔，這只要跟現在北美、東南亞及南半球各地的華僑社會所經歷過的互相對照，便不難想像。

阿伊努文化復興運動和橫濱華僑所包孕的問題，從世界的宏觀角度看，也許可以視作「少數民族」共通的問題而一般化，不過，從小川氏和高橋氏的論文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由於日本社會有着更閉鎖、排外的一面，所以這個問題就越變得深刻。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社會雖已被視為「近代化」（日語的「近代化」，漢語一般譯作「現代化」，為照應下文的「近代」一語，此處姑且保留原文「近代化」的說法——譯者），但對日本國內的「少數民族」來說，「近代化」究竟有甚麼意義呢？我們理應作進一步的思考。

關於這一個「近代」的概念，岡野正純氏在其論文¹⁵中作了這樣的定義：近代是西歐啟蒙思想的產物，是有意識地跟「傳統」社會作對比下引伸出來的反命題。這個定義把近代社會視為由人的理性（科學）支配的、自由而有秩序的文明世界，跟它構成對比的，是由徹底世俗化的教會和神所支配的、封建而無秩序的傳統社會，那是一個停滯不前的、黑暗的世界。然而，被視為理性產物的近代社會，在 19 世紀經過民族革命和工

業革命後，卻產生了下層階級（即大眾）這個怪物。精英階層為着維持其支配的立場，於是另創新的妖魔「民族國家」以封殺之。當近代主義者強調由自由和理性支配的近代社會，應該凌替黑暗的傳統社會時，「近代」與其說是範疇性的，倒不若說是帶有規範性的概念，尤其是在強烈自覺到自己國家「落後」而欲追近、趕過西歐諸國的近代日本精英層眼中，「近代」更是合適不過的模式，它正指示出日本應走的路。岡野氏在有關日本近、現代宗教的研究中，論證了西歐近代化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現時，東南亞地區已達至，或正走向達成高度經濟成長，在分析高度經濟成長的原因時，很多人均歸因於各地民眾共有的「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其中各國的精英階層，尤其對西歐中心的近代化論表露出強烈的懷疑。然而，無可否認的，是不論 19 世紀末以來中國所提倡的改革、近代化論；又或現在亞洲海域以經濟發展為中心而進行的近代化過程中，先行的日本近代化經驗經常都被意識到。如果說日本的近代化強烈地意識到西歐的話，那麼，沒有西歐近代化的模式，亞洲的現代社會恐怕會呈現另一番面貌吧。我們必要做的，既非將西歐的近代化絕對化；亦非把西歐以外某一特定地區的近代化經驗單純地加以演繹，而應該是把各個地域所走的近代化道路視為獨自、但卻又包含普遍要素的歷史經驗，坦誠而虛懷若谷地加以檢證吧。

然而即使如此，日本向亞洲發動「大東亞侵略戰爭」所造成的創傷實在很深，以致令虛心檢討東亞諸國近代化經驗而得出普遍模式的工作，變得格外困難。容應英氏利用的「愛憎症候羣」（love-hate syndrome）的概念來說明日本國民和東南亞諸國國民的關係。¹⁶「愛憎症候羣」的概念，創自日本亞洲研究的泰斗藤澤藩吉教授。一般而言，某一國民觀察另一國民時，大抵都是複眼的，例如我們看美國時，一方面覺得美國物產豐富，經濟具有實力；另一方面又認為美國年青人受毒品荼毒，

殺人、犯罪等無日無之，這兩種印象並存，毫不覺其矛盾。從香港看日本也如是，一方面覺得日本在日常生活上有豐富的消費文化（汽車及其他耐久消費品、日本飲食）和年青人文化（時裝、時代曲、漫畫、村上春樹等的現代小說、電子雞「tamagotchi」）；另一方面，報紙電視上強調的卻是戰爭、日本侵略的歷史和現代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復活等，正面、負面的形象共存。容氏認為，出於中國人之手的日本研究，往往急於強調消極面，觀察日本的目光有欠平衡，她又進一步舉出很多中國人所做日本研究中疏忽的事例，促使我們留意日本在亞洲近代史中曾扮演過的、一定程度上的積極角色。

中國人所做的日本研究不一定客觀，恐怕容氏所言甚是，不過，回顧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所出版有關日本的著述，對日本的態度已較前富彈性，尤其對明治以來日本近代化的成果，明確地予以高度評價。政治立場有異的台灣，所出版有關日本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類似的傾向。上述質的變化以外，用中文寫成有關日本的論述，數量急增，亦同樣使人吃驚。容氏所指在日本研究中出現的偏見，個別論述裏雖仍不鮮見，但整體而言，漢語地区的日本研究縱使未臻於客觀，可是水平卻是不斷向上的。產生這種傾向，不單因為研究者個人的偏好，中國國情的改變（國內實施經濟開放政策、台灣實行民主化等），使研究環境獲得更大的自由，這一點亦不容忽視。

論及日本和亞洲華人社會的關係時，要注意的還有日本大眾文化的影響。這一點在香港特別顯著，當我們向香港年青人詢問他們所懂得的「日本文化」時，獲得的答案不是花道和茶道，而首先是動畫和漫畫，可見後者滲透到他們日常生活裏的程度。日本大眾文化對華人社會的影響非始於近日，早在大眾文化「映像化」以前經已出現。李活雄氏在他的論文¹⁷中述及日本歌謠對香港歌謠界產生影響的歷史及其特質。據李氏說：日本予香港歌謠界的影響非比尋常，幾乎達到改變香港樂壇性質的程度。李氏又將香港對日本音樂的需求，連繫到1980年代

日本消費文化入侵香港，並帶來日本文化熱的現象。他指出：這種現象的背後，有着香港高度經濟成長，促使香港社會中產階級化，以致一般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的因素，所論甚是。

古代中國文化予日本一般的影響，很多幾乎都已完全融化為日本文化的血肉，連不少日本人自認是「日本的」事物中，其實也有着中國的影響。姜羣星氏在其論文¹⁸中提出：他在日本最古老的歌集《萬葉集》中，找到了類似儒教德目「誠」的觀念。「誠」在中國是抽象的倫理觀念，但在日本卻是具象的審美觀念，同時也指人吐露出抑壓不住的真情。

日語教育篇

閱讀日本研究篇的論文時，我們覺得日本和中國、還有廣泛分佈於亞洲的華人社會之間，自前近代起到今日為止，都一直有各式各樣的絲線相互連繫着，然而，日本和亞洲的華人社會在其長期交流的歷史中，卻很難說有正確的認識，原因之一是言語不通，更明確地說，是日本人不懂中國語；而華人則不曉日語。日本自進入文字文化後，雖曾建立了尊重漢字為「真名」的傳統，但這只為學習中國的古典文化，在江戶時代裏，能操中國口語跟華人溝通的，只有極少數（多數是華裔）在長崎擔任「通事」的人。同一時期的中國，雖然有些跟日本做買賣的船員懂得片言隻字的日文，卻沒有以日語「通事」為業的人。

日本以現代式的關注察看中國；又或華人以現代式的關注察看日本，二者都始於19世紀開國以後。日本人學習漢語（不是漢文）；或中國人學習日語的歷史，亦始於19世紀末葉。明治初期有志掌握漢語的，多是跟明治政府的大陸政策扯上關係的軍人和志士之類，漢語學校的設立，也隱藏強烈的國策上的意圖。另一方面，中國有志學習日語的人也有強烈的為國思想，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因此要向日本學習富國強兵的要訣。雖然不能排除明治政府以國策獎勵中國留學生來日本